

吴军 奚特里·N·克拉克  
Terry Nichols Clark 等著



# 文化动力

## ——一种城市发展新思维

Cultural Dynamics:

The New Thinking of Urban Development



人民出版社



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Beijing Population and Society Studies Center



# 文化动力

## ——一种城市发展新思维



吴军 [美] 特里·N·克拉克 等著

Terry Nichols Clark

Cultural Dynamics:

The New Thinking of Urban Development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动力：一种城市发展新思维/吴军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ISBN 978 - 7 - 01 - 016311 - 6

I. ①文… II. ①吴… III. ①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 IV. ①F2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8579 号

---

文化动力——一种城市发展新思维

WENHUA DONGLI —— YIZHONG CHENGSHI FAZHAN XIN SIWEI

吴军 [美]特里·N. 克拉克 等著

---

责任编辑：曹 利

封面设计：九 五

出版发行：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59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01 - 016311 - 6

定 价：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文化动力——一种城市发展新思维》这部著作是青年学者吴军和芝加哥大学克拉克教授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探索，论述了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文化场景，这无疑对于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实践及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讲文化建设，讲文化对城市的作用，很多人觉得比较玄奥，不好把握。吴军和克拉克合著的《文化动力——一种城市发展新思维》一书论述的文化场景理论，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很有意义的分析框架。

——祁述裕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文化和动力都是大字眼，放到一起以“文化动力”来发挥一种发展叙事的，在经典社会理论中可算成就一说的或就是帕森斯。吴军和克拉克的《文化动力——一种城市发展新思维》标明的是一种城市发展的新思维，是把经典的文化叙事从抽象的文化模式论和文化塑造论降到城市的生活“场景”，回到普通人的日常消费，以及建构新的社会实在的观念创意，实现的正是从宏大叙事向中层叙事的学术型转变。从近一个世纪之前芝加哥学派创立的第一个空间动力学的城市研究，到本书或致力于文化动力学的城市研究，我们看到了学脉的继承，更看到了学术的创新。

——于海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是人类行为和社会进步的根。《文化动力——一种城市发展新思维》这本书引介研究的“场景”理论，提出在城市广泛建构文化浸染的空间秩序，人们随时随地不自觉地参与和感受文化的快乐，居民素质提升如影随形。本书不仅构建了城市发展的新思维，更构建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进步的新路径。

——叶裕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型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公共政策平台首席专家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正经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人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正经历变迁和调整，面临诸多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文化是很好的黏合剂，在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能很好地将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进行有机联系与结合，创造性地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作者提出了城市转型发展的“文化动力”思维，将文化、创意与政策紧密结合，提出了解决思路，在此基础上，总结凝练了部分城市发展的经验，对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陈波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文化产业学会秘书长，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库成员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研究”（15CSH005）和北京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创新驱动下北京创客发展需求与流动机制研究”（15JDSHB007）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本书被列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学术文库系列丛书”。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吴长法



# 序言 一

---

这是一本比较有特色的著作。它不只是对国外经验的简单翻译，而是致力于运用城市研究国际前沿理论去思考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动态变化以及动态变化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项艰苦且颇具挑战性的研究工作，也只有深深浸淫在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同时，本书介绍了其他国家一些大城市的发展经验，试图与中国经验进行评估和整合。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对中国社会、城市区域和其他具体细节相当地了解，并保持敏感性与洞察力。

事实上，这本书的撰写开始于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对中国城市发展新变化的思考，促使其阅读国外的文献资料，然后，

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芝加哥与我一起工作。在阅读国际前沿文献时，我们都不断思考与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城市研究国际前沿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城市发展或者怎么借鉴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城市发展。

事实上，在芝加哥，我们每年都会迎来3—5名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我们经常开会或碰面，以工作坊（workshop）和研究项目的形式，讨论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取长补短。我们也会讨论一些抽象的概念并把它模型化，这期间，会用到国际性比较数据和一些中国的具体例子。

这就涉及早期的、关于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另一本中文著作<sup>①</sup>，这本书总结了芝加哥学派20世纪城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吸引了一些年轻学者来芝加哥访问。他们每年都会带来一些比较微妙且有趣的见解，并询问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年复一年。当下，我们沿袭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传统，把21世纪城市研究的主题聚焦到场景（scenes）上来。

我们中国研究的另外一个主要进展是，获得中国民政部邀请，完成了一项关于中国社会组织 and 全球经验的比较研究，此研究聚焦在一些中国可以避免的教训上。这些工作的完成，离不开与我们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工作过的中国学者，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研究组。一些学者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来来往往，并积极地推动这项跨国研究，通过

---

<sup>①</sup> 这本书是《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R. E. 帕克等著，宋俊岭译，由商务印书馆2012年9月出版发行。

论文和著作来介绍与推广我们的研究。

他们的论文或著作说明了，（我们的理论成果）对中国城市化动态变化的分析开始向更深入、更微妙的方向推进，尤其是结合全球大城市城乡迁移模式的变迁。比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住宅开发、阶层分化、文化动力、市民参与、移民模式、社区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等现象会随着年龄、性别、教育等分类呈现出差异。

实际上，仅仅通过对年龄、性别、教育、职业以及其他变量的简单调查分类，很难“捕捉”到这种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妥帖的办法，即可以通过测量生活文化设施（amenities）<sup>①</sup>和市民参与（组织），比如，餐馆、艺术馆、博物馆、教堂、公园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捕捉”这种变化。

对城市研究来说，在分类中加入这些重要指标是非常关键的。这些指标的组合能够反映市民、移民、求职者或城市流动者“流动”的真正或者更深层次动因。比如，为什么到这里找工作，而不是其他地方；为什么在这里开店，而不是那里；为什么选择这个城市生活，而不去选择另外一个城市。

---

<sup>①</sup> amenities 直译为便利设施，但在克拉克的表述中多数情况是指以生活文化设施为导向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他把 amenities 种类大致分为四种：自然物理设施，如气候、温度、湿度、可接触的水资源以及自然景观等；人工建构的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剧院以及一些尺度小的设施（书店、果汁店、星巴克、自行车比赛/专用通道）等；社会经济结构与多样性，如本地居民收入与教育、外国人或其他民族人的数量情况、同性恋人群及家庭等；本地区居民的价值观念和态度，如友善或敌意、包容性、敢于冒险、个人主义等。amenities 的含义非常丰富，很难找到一个与其完全对应的中文词语，经过反复思考，本文采用“生活文化设施”来指代它，重点强调基于生活文化设施为导向的公共产品以及其对本地区生活质量的贡献。

这些指标提供给我们更多、更详细的信息，以及一个理解行为者意图的动态变化背景（contexts）。比如，市场运作的制度障碍在哪儿，实现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决策需要什么，等等。

我们认为，无论是对于政府官员，还是对于各种房产投资者和参与者们来说，这是最基础且必要的知识。比如，从银行经理到地方官员，在作决策时，什么样的举措和策略能够很好地让潜在消费者和房屋拥有者（产品创造者）进行完美匹配。从他们（芝加哥大学留学生和访问者）的研究中，我获得了关于中国的一些关键资讯，初步了解了中国城市快速的、大规模增长与变化的总体形势。

重要的是，这些议题都有一个重要的“本土聚焦”（a critical local focus）。例如，城市市长在进行关于住房建设或者贷款项目单个决策时，他们会把这些本土具体事件放置到更高、更深的层面，通常是整个中国城市体系的国家系统，抑或是为什么一些成功的人群比较喜欢去某个城市，一些大的公司比较倾向于在某些城市选址。这些都是我们探讨与研究的场景概念，或者是背景性知识。如果城市或区域不能提供诸生活文化设施（amenities）与供给服务（或良好软环境）的正确组合，人们就不可能搬迁过来，公司也不可能向该区域拓展业务；甚至是，中国和外国投资者也会避开这些地方，而选择那些拥有且可以提供良好场景的其他城市。这就加剧了北京和上海持续的人口压力，带来了交通拥堵、高密集人口、高房价与租金、人口膨胀与工作机会减少、高失业率，以及家庭与邻里纽带

的衰弱等一系列问题。

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提供一个固定程式或明确答案，而是围绕一些核心的概念元素、相关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策略展开工作。我们的目的是创造（理论）工具，把这些新的、动态变化的城市、社区、区域以及其他小的单元，这些零碎的新现象，整合到一套科学且有效的学术话语体系中，以便更好地解释和洞察当今急剧变化的城市社会。我们把这套新学术话语体系称为“场景理论”。

中国是一个如此大的国家，人口超过 500 万的大城市就有 15 个之多，上海与北京的人口早已超过两千万。在中国，传统上采用较大区域单位的分析，由于缺少更细致、精确、丰富且多样的微观数据，很难支撑起这样的宏观水平研究。无论对于政策本身还是政策制定者与分析者来说，现有的可供研究的数据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面。相反，诸如日本与韩国，研究、报告出来的数据比较丰富与精细，分析单位也比较小。而中国现有的这方面的研究数据非常有限，且停留在较低水平，很难分析与解释政策目的。如果下一步研究工作能够把更小的单元作为分析单位，比如，街区地址（street addresses，相当于一个邮编号范围）或者一个街区（block locations），将为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

这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展现了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研究行动的一致性，即从城市场景研究转向了所谓的“大数据”。例如，在芝加哥，我们的场景数据库几乎囊括了所有街区（blocks），对诸如自行车偷盗这类事件从空间上的

经度与维度进行标记。在这些百万之多的数据基础上，我们用电脑来映射（绘制地图）和解释这些数据背后的逻辑，辨认事件的本质，然后再上升到更大单元。比如，对于主要犯罪（prime crime）的重新定义。

传统观点认为，少数民族中的低收入群体是美国犯罪的主要来源。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对美国 50 个州的地理空间数据测试基础上的，包括芝加哥。但是，这种测试经常是通过制作简单地图来展示穷人聚集地区与犯罪率高发地区的类似或重叠，或所谓的“匹配”。然而，近年来，警察部门发布了精确的犯罪数据，重新定义了犯罪的概念。犯罪高发区主要是在铁路沿线和火车站。低收入人口多的地区并不见得犯罪率就高，相反，远离火车站或铁路沿线的人口聚集区犯罪率普遍比较低。这就推翻了我们对于犯罪的常识性认知。

很显然，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书，它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根本途径去重新思考大城市的发展动力。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们每天都要面临的基础性问题。书中的一些部分可以直接拿来运用，以提升我们的政策模型与决策水平。其他的部分（或观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改进与完善，尤其是配合新资料来改进它们的运作方式。毫无疑问，相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宏观理论，“场景”是一个中层理论，比如，丹尼尔·西尔佛（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和我共同写作的《场景》一书中提及的 15 个维度和研究假设。

特里·N. 克拉克  
芝加哥大学  
2014 年 9 月

# 序言 二

---

城市自产生以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快速的城市化仅有几百年，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生产力的快速进展使得大规模的城市化成为可能。因此，无论是城市的产生还是城市的快速发展，学者们普遍的共识就是，首要的因素应当是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

但如果认真分析这一“普遍共识”的深层，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生产力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历史变迁的大致轨迹。工业革命后的几百年间，城市的生产力结构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城市中不仅有大量的轻工业企业，也有规模庞大的重工业制造基地，如钢铁、化工、煤炭等。社会结构中也是以产业第一线的蓝领工人为主。

这种状况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电子信

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从而引起了生产力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后工业社会”。这一时期，社会的生产力结构开始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即服务型经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大。而由于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为重心，科学技术广泛地成为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因此，科技人才成为社会的精英。“后工业社会”的城市的首要特征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第一产业，而是从事第三产业，如科研、教育、医疗服务、交通、娱乐、金融、法律、管理、创新、开发、设计、通信、广告、安全、项目策划等。

社会结构同样发生了变化，在服务业工作的白领职员开始超过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另一个变化就是城市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即技术阶层人数的增长率开始超过劳动力总数的增长率。

在后工业社会中，怎样才能让城市进一步发展，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城市学者和城市社会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全球大城市研究的代表人物，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莎森（Saskia Sassen）提出，那些能够为跨国公司指挥枢纽和高端服务业提供基础设施硬件条件如网络信息技术、人才，以及能够为在上述部门工作的人员提供便利的生活设施和生活方式的都市将得到更快、更高层次的发展。

哈佛大学的城市经济学者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2001年提出“消费城市”的概念，认为未来城市竞争力



在于是否能够吸引高级人力资本的能力上。同样，多伦多大学的学者佛罗里达认为，创意产业的兴起已经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创意阶层作为产生创意的主体，由此应运而生并飞速壮大，成为国家之间、城市之间争夺的重要资源。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特里·N. 克拉克则指出，随着传统制造业在城市中撤离和衰落，以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休闲娱乐等为主的新兴产业方兴未艾，城市不仅仅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同时也是从生产导向朝着消费导向转移。他将这种城市形态称之为“娱乐机器”。他认为，建设以消费为导向，以生活文化设施为载体，以文化实践为表现形式的“场景”，是吸引创意阶层的首要因素。

本书是对以上问题和主要理论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和理论对于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9年以后才快速发展起来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6.1%。今后，我们国家如何进行进一步的城镇化，如何在全球大城市体系中既具有竞争力，又能逐步消除诸如拥挤、污染、不方便等“城市病”，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学术上，吴军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博览群书。在芝加哥大学研修期间，他跟随特里·N. 克拉克教授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并多次参与讨论与交流。应当讲，对上述方面的研究理论、观点和方法，他是国内把握